

中国文学再认识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勤慎论丛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期文存·卷之一

中国文学再认识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再认识/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
(勤慎论丛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 期文存·卷之一)
ISBN 978-7-309-09216-5

I. 中… II. 杭… III. 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391 号

中国文学再认识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97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16-5/I · 715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勤慎论丛”序

何 俊

作为人类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庞大的部分,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应该获得怎样的支持,这原本好像是很清楚的事情,现在却成为越来越需要探讨的问题了。“勤慎论丛”仅仅只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出版项目,用于汇集文科教师独立而自由研究的学术论文,但其背后却也潜藏着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些许思考与探索。

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通过合并、升格、搬迁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扩张性发展,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学子们上大学的愿望。但是,接踵而至的挑战仍然很大,甚至更为艰难,这就是如何使高等教育真正名副其实,让走进校园的学子们获得的教育真正称得上是“高等”。坦率地说,这一挑战对于杭州师范大学尤为艰难。

这种艰难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在外部境遇上,由于中国的高等院校被分别归入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次中,身份的差别决定了各种资源的差别,因而像杭州师范大学这样一所行政上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梯状结构最低一层的市属地方性大学,其发展存在着境遇上的困难。当然另一方面,根本的困难是来自自身。杭州师范大学是在原杭州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整合了杭州其他七所大中专学校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虽然经过努力,学校整体的办学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薄弱的基础要变得厚重,显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不过,世事总有它的另一面。梯状结构所带来的资源限制,通常



能够调动地方在自身可控的资源方面给予大的投入；而薄弱的基础则往往具有可增加厚重的可能。当然，一切的可能要变为现实都仰赖于人的自觉与自愿。所幸的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要使自己唯一的大学能发展成与这个城市相得益彰的高等学府，因此不仅给地给钱给名额，造园起楼、买设备引人才，而且更期望学校能坚定不移创一流，坚韧不拔走新路。学校上下也众志成城，不甘于平庸，并将自己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形象地命名为“攀登工程”。

在这个工程中，包含了许多项目，学风建设、人才环境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平台建设……可想而知，这些项目几乎会涵盖学校建设的每个方面，从硬的到软的。其中，就有一个与“勤慎论丛”相关的项目，称作“人文社科振兴计划”。依常理讲，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固有的基本内容，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必然会涉及它的建设与发展，校长叶高翔教授——一位由浙江大学的领导岗位被请来执掌杭州师范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学家——为何还要提出专立此项目？而且校长一经提出，即获得学校党委肯定，并为全校教师认同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二：一是在高等教育的建设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遵循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对于杭州师范大学来说，人文艺术有着独特的意义。

其实，前者原本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似乎已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认识与阐明的事实了。20世纪以来，科学已成为现代知识系统的代名词，在中国尤其如此。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似乎看不到科学的真正精神在于尊重面对的事实，以符合认识对象本身特性的方式获得与构建相应的认识，而是把追求真理的科学简单地化约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具体工作方式，并进而以之范导知识生产的所有领域。因此，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领域中的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建设面临着难以言说的窘境：明明意识到自然科学技术的那些生产方式与评价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自己领域的知识生产，却又自觉不自觉、自愿或被迫搬用或变相搬用自然科学技术的生产方式与评价标准。结果，文科领域内的学者们日益眩目于各种各样的知识生产数据、考



评表格等量化指标,而对诸如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等真实现象与问题的关怀销遁于自己所生产的所谓科学研究的泡沫中。事实上,这种窘境在中外高校中是共有的现象,但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一流建设希望能多少改变一点这样的窘境,具体的举措就是让文科走自己的路。

至于后者,则是由杭州师范大学的历史与未来决定的。学校的前身是清末科举废除后浙江于1908年兴办的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其后演化为民国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直至1978年的杭州师范学院和现在的杭州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经亨颐先生虽然留学日本专修物理学,他本人也是近现代中国物理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但他的办学理念在人格教育,所立校训是“勤慎诚恕”,高度重视人文与艺术教育对于人的培养的意义。唯此,浙江一师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起源地。秉承这一传统,杭州师范大学始终有着浓郁的人文与艺术氛围,这不仅与过去的杭州相映衬,而且更与杭州未来的愿景相吻合。因此,杭州师范大学希望自己成为“人文学堂、艺术校园”。

只是,对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早已成为一个强大的“他者”。人们希望摆脱这位“他者”的笼罩,成为自在的主体,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却似乎早已陷入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以“他者”为依归,或随风起舞,或亦步亦趋。更何况,对于人文社科的知识生产而言,整个认知与评判系统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人们都已承认问题的严重。

尽管如此,“人文社科振兴计划”的设立终究为杭州师范大学的文科教师打开了一页可以仰望天空的天窗,可以让有心愿的人从这页天窗放飞自己的梦想。譬如,在依旧或者必须忙着搭建平台、组织团队、申请经费……以外,我们还觉得“人文社科振兴计划”应该充分肯定、支持、鼓励文科教师进行独立而自由的研究,为此特意取来校训中的前二字,设立了“勤慎研究项目”。按照经亨颐先生对校训的解释,“勤”就是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好古敏以求之”、“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经先生深信《周书》所讲的“业广惟勤”，还有《韩子》所说的“业精于勤”。对于“慎”，经先生既取孔子对子张的回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又取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并申言：“此虽不明言慎而曰惧，曰好谋，则慎之意也。”因此，“慎”实是严谨与智慧的统一。我们相信，一个秉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人文社科学者，在与流水线般的知识生产保持着某种距离、有点冷清甚至不免寂寞的状态下，如果还能真正生产出知识精品，唯有坚持“勤慎”二字。

原本希望，经过数年的努力，“勤慎研究项目”可以垒土成丘、集腋成裘，将大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汇集，编成“勤慎论丛”。适逢以人文艺术为特色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今秋迎来第200期的纪念，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同仁们建议，从《学报》的论文中精选一批论文，按照主题编成若干册，作为“勤慎论丛”的第一批，这些来自海内外学者、成于不同年月的知识产品，既可以作为对《学报》200期的庆贺，又呈现了“勤慎研究项目”的旨趣。这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它们为后续的“勤慎论丛”作了精彩的开端。

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期待不断延续的精彩！

2012年教师节





目录



“勤慎论丛”序 何 俊(1)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章培恒(1)

20 世纪中古文学研究与佛教的因缘

——以《孔雀东南飞》和“永明声律论”的争议为中心

..... 戴 燕(16)

回归与超越

——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 刘跃进(35)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 杨 义(48)

贺知章的文学世界 陈尚君(87)

阐扬幽韵与表彰声色

——袁宏道的为人与为文 陈平原(100)

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 张树国(120)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陈思和(136)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美]王德威(148)

对 20 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的四点思考 陈子善(185)

试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先锋派概念

..... [美]唐小兵著 朱羽译(192)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日]坂井洋史(211)

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郗元宝(224)

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

——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罗 岗(246)

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从《黑魇》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 张新颖(268)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 吴义勤(282)

回味感动

——另当别论的金庸小说 徐 岱(296)

重新认识左翼精神史的资产

——论陈映真《乡村的教师》..... 陈光兴(322)

编选后记 朱晓江(336)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 古今演变

◎ 章培恒

——

作者简介：章培恒（1934—2011），男，浙江绍兴人，生前曾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洪昇年谱》《献疑集》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等。

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 20 世纪初。至 1917 年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并进而形成“新文学”（早期的“新文学”也称“五四新文学”），现代文学遂呈现出崭然有异于古代文学的特色和面貌。由于新文学的产生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并把这种“断裂”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总体辙迹而论，本来就是在朝着新文学的方向发展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使之突然加快了速度，成为飞跃。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的新文学之间实有内在的联系；作为其有力证据的，是在文学革命发生的许多年以前，古代文学中就已陆续出现了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新文学的萌芽的作品。就其与新文学的出现在时间上距离较近的此类作品而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里是指该书的前八十回，下同）和龚自珍的诗文等都是



重要的代表。关于龚自珍诗文与现代的新文学的内在联系,谈蓓芳教授的论文《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1]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本文拟对《红楼梦》的有关情况加以探讨①。

对于文学革命以降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二十年间新文学的基本特征,笔者曾作过如下的描述:“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中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使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上述这三者在新文学中是彼此联系、相互渗透的……”[2]至于《红楼梦》里的新文学的萌芽成分,也可分作三点来阐述。

首先,在《红楼梦》对一系列人物的描写中,至少在客观上体现了人性与环境的冲突以及人性被压抑的痛苦;这与上述新文学基本特征中人性解放的要求显然有相通之处。

以《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来说,这是一个有文学天才、“任情恣性”(第19回)而又性早熟的男孩;他所要求的,是心灵活动的广大空间和温馨的感情世界。但环境却逼迫着他,要他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投身于冷酷的仕途。为了改造他,他的父亲甚至不惜加以痛打,几乎置他于死地。这使他的内心深处深感孤独乃至绝望,他只企望在青年女性的爱抚和哀痛中早日死去,形骸化为飞灰乃至轻烟(参见下引第19、36回有关文字)。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系据《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通称“庚辰本”,因书中有“庚辰秋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字样),个别脱误之处系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戚蓼生序《石头记》补正,不另作说明。



他在书中第一次出场时只有(虚岁)七岁(第3回)^①。到十一岁时,他父亲带着他和一众清客到刚建造的别墅大观园去,为其中各处题匾额和对联^②。在这一场合,他不仅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而且因不愿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与父亲贾政发生了冲突——这也正是其“任情恣性”的表现之一。先看其显示才华的一个例子:

……步入门时……只见许多异草……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贾政道:“薜荔藤萝不得如此异香。”宝玉道:“果然不是。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菖兰,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荃草,这一种是玉簪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藿药藿蓐的,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绦的,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样,又有叫什么绿萼的,还有什么丹椒、薜荔、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说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说。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众人笑道:“再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若何?”一人

-
- ① 据该回林黛玉自述,贾宝玉“比我大一岁”。又据第2回所写,林黛玉跟贾雨村读书时为五岁,“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林黛玉母亲死了,她父亲就委托贾雨村送她到贾府去,所以她进贾府与宝玉见面时为六岁。
- ② 据《红楼梦》第17至23回所写,贾宝玉等人于此次题匾额及对联的第二年就搬入大观园。他在大观园中写了《春夜即事》《夏夜即事》《秋夜即事》《冬夜即事》等诗,“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录出来各处称颂”(第23回)。按,这些诗当是搬进大观园后在两年间陆续所作,故称之为“十二三岁的公子”;然则其题匾额对联时为十一岁。



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麝兰芳馥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诗云‘蘼芜满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联，诸公评阅评阅。”因念道：“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贾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题一联。忽抬头见宝玉在傍，不敢则声，因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宝玉听说便回道：“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洲渚之类，若要这样着迹说起来，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贾政道：“谁按着你的头叫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宝玉道：“如此说，匾上则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对联则是‘吟成苴蕙才犹艳，睡足酴醾梦也香’。”贾政笑道：“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不足为奇！”众客道：“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成蕉叶’犹觉幽娴活泼，视‘书成’之句竟似套此而来！”（第17回）

他不仅知道《离骚》《文选》等书中的许多奇花异草之名，并且能辨认生活中的许多异草，显示了他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东西的真诚爱好；较之他父亲与清客们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淡漠或无知，显然是另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他对“兰麝”、“三径”两副对联的批评及其自己所作，则体现了他对生活中的美的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清客们的对联之所以只能用眼前根本不存在的兰麝洲渚之类拼凑，就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其所处身的景物的美。而他则不但感受到了这种美，而且还想象着他如在这里生活将是怎样一种情景：他将能写出绮艳的诗，在梦中也闻到酴醾的芬芳。而且，尽管“吟成”句受到了前人“书成蕉叶文犹绿”之句的启发，但较之“书成蕉叶”确实“犹觉幽娴活泼”，视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为过；同时也可看出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已经读了许多古人的诗篇，并能自由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

在这个例子里其实已可看到他的“任情恣性”以及由此所受到的压抑；当他漫无拘束地显示出自己在植物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其父亲



和清客们时，他就受到了严厉的呵斥。然而，与以下的一个例子相较，这还算是轻的了：

……说着引人步入苑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大观园中的另一处建筑名。——引者）多矣！”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无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負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出去！”（第17回）

很明显，贾宝玉的这种见解实在比他父亲高明，但他说出了自己看法后，所受到的却是如此无情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愿违心地附和父亲的意见，而且坚持自己的看法，无畏地跟父亲辩论。由此而言，他的“任情恣性”正是一种可贵的尊重理性的精神。

也正因“任情恣性”，他跟父亲以及整个环境的矛盾远不止在对“自然”的理解上，更重要的是在人生道路上。过了不久，他就围绕着“仕途经济”问题和史湘云、袭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



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第 32 回）

可见他始终没有改掉“小时”的“信口”之语，仍把“读书上进”、“仕途经济的学问”看作“禄蠹”的“混账话”。而他之憎恶这些，显然并不是怕读书。如上所引，他对《离骚》《文选》就读得很熟，书里的奇花异草之名都能记得；对于《庄子》也很喜爱，“……看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搥斗折衡而民不争，殄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搥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第 21 回）对诗、词他更为用心，曾以“花气袭人知昼暖”的诗句为一个姓花的丫头取名袭人，以致贾政批评他“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功夫”（第 23 回）；至于《西厢记》等作品，尤其让他废寝忘餐，他对林黛玉说：“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 23 回）所以，他并不是厌恶读书，而只是厌恶那些“禄蠹”们必读的关于“仕途经济”之书。换言之，他的“任情恣性”既导致了他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怀疑，也使他追求着精神世界的广阔空间——从《庄子》直到《西厢记》。

这种“任情恣性”跟他的性早熟相结合，更使他成为当时现实中的另类，也更加深了他与环境的冲突及其痛苦。究其性早熟的原因，一则是这等富贵之家的孩子所难免的营养过剩，二则是滋补药的作用（例如第 23 回就有宝玉母亲王夫人嘱咐宝玉“天天临睡的时候”吃丸



药的描写；宝玉并未生病，此等药自是滋补性的；当时宝玉十二岁）；三则因其从小就和一群女孩子一起生活，并由好些丫鬟服侍，其中还包括了“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的袭人（第6回）；在《红楼梦》八十回本中，唯一与宝玉有过性关系的女子就是她。总之，由于性早熟，加之所处的又是一个实行多妻制的社会，他不但很早就与林黛玉之间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而且还深深地爱着丫鬟晴雯；当然也爱袭人。另一些丫头如金钏、芳官、四儿等与他虽无暧昧，却亲密到不拘形迹。而且，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他还有同性恋的倾向；跟秦钟、蒋玉菡都已不只是一般的朋友，虽然未必有肉体关系。而这一切在他父母眼中都是不可宽恕的。他母亲虽然舍不得责打他，却把金钏儿、晴雯、芳官、四儿先后赶了出去，只留下了向她告密、从而获得了她信任的袭人；其结果是金钏、晴雯悲惨地死去，芳官也被迫出了家。他父亲因蒋玉菡是忠顺王的优伶、而且是王爷所“断断少不得”的人，贾宝玉竟与他亲厚，以致忠顺王遣人前来诉告，连累了自己，更是“气的目瞪口呆”，又误以为金钏儿是因宝玉“强奸不遂”而自杀的，气愤之下竟要把他活活打死，后来虽被阻止，宝玉已受了重伤（第33回）。这一切都强化了贾宝玉与环境的冲突。在被父亲责打以后，林黛玉来看他，抽抽噎噎地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可见他已决定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处在这样的压抑之中，他本来就已深感到生活的灰暗，只有从其所亲爱的几个青年女性那里才能得到慰藉，因而希望她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第19回），到金钏自杀、他自己被父亲毒打以后，他的厌世思想进一步凸现出来，竟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36回）及至晴雯等都落



了悲惨的结局,他更感到生活只是受罪:“余犹桎梏而悬附。”(第78回,“悬附”即“附赘悬疣”之意,出《庄子·大宗师》)所以,在宝玉身上所体现的,乃是“任情恣性”所导致的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及其无尽的痛苦——人性在环境压抑下的深刻悲哀。

而且,在《红楼梦》里这样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宝玉身上,黛玉、晴雯、芳官等也都是由于不能克制自己的性情才为环境所不容的。就黛玉来说,她毫不掩盖自己对宝玉的爱情以及在爱情中产生的矛盾乃至争吵,而这一切正是为当时注重礼教的环境所不容的。所以,尽管贾母本来很爱黛玉,但后来也对她日益不满,认为她不能做宝玉的妻子,曾想为宝玉向薛宝钗的妹妹宝琴求婚,只是宝琴已订了婚,这才作罢(第50回)。所以,《红楼梦》80回以后宝玉与宝钗成婚、黛玉悲惨而死之事虽是高鹗续写的,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黛玉的命运极为悲惨却是曹雪芹预定的结局。

《红楼梦》通过这么多人物所显示的人性与环境的冲突和人性被压抑的痛苦,跟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学要求人性的解放显然是相通的:既然已感到了被压抑的痛苦,接下来自然是解放的要求。

其次,在《红楼梦》的写作中已含有写实主义的成分,这为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积极吸收西方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众所周知,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其前二十年的小说是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的,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写实主义虽是西方传人的写作方法,但“如果最简略的说,写实主义乃是要求恰如其分地真实描写现实的文学主张。倘若再稍作阐释,那也可以说,它还使文学至少具有如下的特色:第一,写实主义的‘真实描写现实’,乃是以文学的手段,具体、细致、丰富、深入地写出现实的真实;第二,这样的‘真实描写现实’,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实现的,因而作品中的人物——至少是主要人物——必然是像实际上的那样丰满、复杂、生动”[3]。正因如此,作为自成体系的创作方法的写实主义固然是从西方传人的,但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实已包含了写实主义的成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和